

创业维艰毁誉多

——项英与皖南事变前的新四军(十七)

(解放军)
胡居成

叶挺再度出走引起的风波

3月15日周恩来走后,叶挺集中精力处理日常军务。一是主持编写了《关于新四军对敌作战说明书》,总结一年来新四军进入江南作战的战绩和经验;二是主持召开了新四军第二届参谋工作会议;并在会上以《现代战争的性质特点与指挥》为题,发表了演讲,提出要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认识战争,要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发展来分析战争,了解近代战争的特点。这篇讲演,从宏观和理论上阐发了关于战争的性质、意义及其发展前途,提出要重视军事正规化、现代化建设。

参谋会议过后,中共中央批准了项英关于设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的报告。叶挺于4月下旬亲自渡过长江,到皖中庐江地区,执行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整顿高敬亭的第四支队、开辟皖东抗日根据地几项重大使命。叶挺在张云逸、邓子恢等人大力协助下,历时3个月,完成了第四、第五、第六支队和游击纵队的扩编工作,推动各部队挺进皖东、皖中既定地区,使党中央向东发展、开辟皖东的战略方针,得到了切实的执行。叶挺于8月上旬,从江北回到云岭。

叶挺这次去江北,离开项英,相对独立地执行党中央交给的任务,干得得心应手,并取得了显著成绩。可是,项英却表示并不完全满意。

项英对叶挺主持处理了“尾大不掉”的高敬亭问题,非常赞赏。他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说:“此次解决高敬亭叶最坚决,起作用很大而很努力,在政治上对党均有极大进步。”但对叶挺积极扩大部队、组织部队挺进皖东和要为彭雪枫支队争取正式番号、解决经费等所作的种种努力,却又忧心忡忡。对前者,他担心这样做,“会使同盟者怕,而对我更加防范和限制”;对后者,他竟泼冷水说:“既然给养困难,就不应该大量发展武装!”还说如设置第六支队番号,也应冠以“暂编”二字。叶挺看到时至今日,项英仍在战略大计上和他拗着劲

干,所以对于继续与项英合作共事,完全失去了信心。加上国民党五中全会以后执行防共、溶共、限共、反共政策,不断地制造进攻、限制新四军的摩擦事件,国共关系越来越紧张,他在两党两军间的调解作用愈来愈小,面对着“煮豆燃豆箕,豆在釜中泣”的现实,叶挺深感有愧初衷,无能为力。他再次萌生了离开新四军的想法。

叶挺第二次离军出走,行前没有向项英作任何透露,只是说要去重庆向国民党、蒋介石交涉全军经费和江北部队扩充的编制问题。叶挺于9月上旬乘汽车离开云岭,10月初到达重庆。当时周恩来因右臂骨折,已去苏联就医。叶挺向董必武、叶剑英谈了他准备向蒋介石交涉经费、编制问题的计划,表示要力争获得解决。11月间,蒋介石召见了叶挺。叶挺向他报告了整顿第四支队等工作,并提出三点要求:一、全军经费至少增加到每月30万元;二、江北各部队均须给以合法名义;三、如经费不加,则新四军将在其驻防区内放县花,就地筹给养。

“叶项不和”,蒋介石已有所闻,这次接见时对叶显得特别亲昵。但当他看到叶挺仍然不遗余力地为新四军要编制争经费,就有些不高兴。他虽然答应考虑叶挺的要求,但又埋怨叶挺说:“希夷,我任命你为新四军军长,但你未起到领导作用,只知道替人家要钱要枪,无限制地扩大部队。共党惯于搞政治斗争,你只要好自为之。”蒋介石还问了叶挺在新四军自由不自由,书信电报受不受检查,共产党有没有叫他恢复组织关系,想不想参加国民党等一大串问题,还说如果叶挺参加了国民党,新四军的编制、经费都好解决。

叶挺听着蒋介石这些居心叵测的提问,感到很讨厌又很可怕,使他更加坚定了辞职的决心。他回答了蒋介石提出的问题,明确表示现在他哪个党都不参加,只想参加抗日救国。然后表示,新四军在浴血抗战中得到发展,却连合法名义和最低经费也无法解决,他这个军长实在难当,他想请求辞职。

前几次叶挺要求辞职,蒋介石都是讳莫如深,但这次的态度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不但同意,还说:“项英霸道,你为人正直,斗不过他。离开也好,或许有比四军更有意义的工作让你做。”

从蒋介石蓄意挑拨、拉拢来看,叶挺担心他真的派给他一个什么差事,于是借回乡为胞弟叶辅平办理丧事为由(新四军军需处长叶辅平,9月间前往越南接运海外华侨捐赠给新四军的医疗用品,因汽车在广西倾覆而牺牲)提出请假。蒋介石同意,并批给国币5000元,作为抚恤金。

项英见叶挺离开军部两个多月音信全无,心中忐忑不安,致电南方局询问,回说回老家为亡弟办丧事去了。一天项英见到医务处长沈其震,问他可知叶挺的情况,什么时间回军部来。沈其震说,他送叶挺到屯溪时,叶挺曾把他此行要求辞职,不愿再与项英共事的想法告诉过他,可能“叶挺这次出去不打算再回来了”。项英听了沉默良久,他想到周恩来来到皖南来传达中央对叶挺工作的安排意见,想到周恩来对自己的多次批评,意识到他对叶挺这次出走,不能只向中央发个电报了事。他对沈其震说:“你把他送走了,就由你再去找他,把他请回来吧!”沈其震走时,项英让他带给叶挺一封亲笔信,敦促他以新四军数万部队生存发展为重,回到重庆去,就经费和编制两件大事,再次进行耐心交涉。并请叶挺回皖南,继续共同领导新四军完成抗战大业。叶挺看信后,对沈其震说,自己对交涉前途毫无把握,但仍争取在一个月内赶回重庆,从各方面疏通关节,尽力求得解决。对于项英请他再回皖南,他仍表示不愿意。

1940年春节过后,叶挺偕同夫人李秀文乘飞机回到重庆,继续执行交涉使命。这一次他没再找蒋介石,而是通过老相识的门路,在国民党军委会系统,进行多方疏通。大概蒋介石想给叶挺一些面子,活动的结果,还是有点收获。第六支队的番号被认可,但组建经费不予单发。全军经费由9万元增加到13.2万元,而且其中包括2000元医疗费,真是少得可怜。

办完这件事之后,叶挺打发沈其震回皖南,他和李秀文留在重庆。这时他的处境有些微妙。他向蒋介石辞了职,但未明令公布。他不想回新四军,但有关新四军的事情,他还积极去办。

5月,周恩来伤愈从苏联回到延安,不久,经西安回到重庆。刚到重庆,就接到中央书记处发来的电报:项英、周恩来、叶剑英、廖承志:

蒋在西安向我们同志表示,叶挺已离开新四军,因此新四军问题须重新解决,有另派他人去新四军任军长之意。在江北四支队及八团,则已有不准用新四军名义,只许称高支队之事。因此:

- 1、周立即约叶挺到重庆谈话,彻底解决其在新四军工作问题,并要叶挺向蒋介石表示愿回新四军工作;
- 2、对新四军之其他解决办法如另任军长等,我们

表示坚决反对,并对四支队、八团不准用新四军名义事,表示抗议,要求蒋介石下令纠正;

3、在周与叶谈话中,应确定叶在新四军之实际地位与实际职权,以坚定其在新四军之安心工作。

周恩来放下一切事情,和叶剑英一起,到中共中央南方局大梁子青年会招待所找到叶挺。周恩来这次没有从叶、项关系谈起,因为有关这方面的话,他过去已经说得很多了,而是先把党中央的电报拿给叶挺看,让叶挺先了解电报内容,以便按照中央的要求,把事情办好。

周恩来告诉叶挺,蒋介石在第一次反共高潮失败以后,已将反共中心由华北转向华中,下令强迫新四军江北部队调往江南,同时又密令苏鲁战区副总司令兼江苏省主席韩德勤、新任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兼安徽省主席李品仙,要他们联合行动,准备夹击江北我军。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亲自跑到西安,重提叶挺已离开新四军,新四军问题要重新解决这件事,说明他想利用叶挺要求辞职这个机会,另派一位所谓“能够完成他的希望”的人担任新四军军长,借以达到他在政治上打击共产党,在军事上为进攻新四军作好准备的目的。周恩来和叶剑英都希望叶挺能从他的辞职会给新四军和抗战前途带来什么后果和影响考虑问题。他们认为,只要叶挺把这个问题想清楚了,便是处境再困难,委屈再多,也会与新四军这支真正的抗日部队同呼吸共命运,坚持抗战到底。

党中央的理解关心,周恩来的循循善诱,又一次打动了叶挺,他爽快地表示,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再次回皖南。周恩来立即着手帮他准备。经中央同意,周恩来给项英发了电报,要他另派一名高级干部来重庆接叶挺,并与南方局讨论彻底解决叶挺在新四军的实际地位与实际职权问题。

项英对周恩来的电报十分重视,指定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执行这个任务,并立即启程赶往重庆。

袁国平6月10日到达重庆南方局。周恩来通过个别交谈和吸收他参加南方局会议,同他一起研究团结叶挺一道工作和执行“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方针。

周恩来说,党中央从组建新四军开始,便要项英同志处理好与叶挺的工作关系。但项英做得很不好,以致弄得叶挺感到待不下去,再三要求辞职。周恩来要求袁国平回皖南后,如果项英再不团结叶挺,可在党内开展思想斗争,批评项英的错误。

至于叶挺如何向蒋介石收回辞职要求,周恩来运用他的巧妙斗争策略,决定叶挺不去见蒋介石,只以叶挺名义给蒋介石写一封信,告诉他不想辞职了,仍愿回新四军工作,然后来个不辞而别了事。

7月底,叶挺冒着酷暑,回到了皖南。

(责编 启元)